

第一篇 论形而上学真理的源泉

(被缚的巴门尼德)

Και δοκεῖ ἀναγκὴ ἀμεταπειστον τι εἶναι ὀρθῶς.

必然性不听劝说。^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5a 33

—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数的神秘。但无论存在周围的神秘多么难解，最为难解和最令人不安的却在于，神秘是一般存在的，我们仿佛彻底和永远断绝了与生命之本原的联系。在我们在这世上所见证的一切之中，这是最荒谬最不合理的、最可怕的，甚至是反自然的东西，它无可遏制地引起了我们的如下思想：要么并非世上的一切都尽如人意，要么我们获取真理的方法和我们对于真理的要求由于某种缺陷而遭到了根本失败。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真理，我们都永远不能否认笛卡儿的 *clare et distincte* (清楚明白)。然而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永恒的神秘，永恒的不可透性，仿佛

^①这是舍斯托夫对这句希腊文的简略翻译。确切的译法应是：“必然性似乎不可能被劝服。”

在创世之前，就有人决定永远关闭人通往他最需要和对他最重要之物的道路。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的思维所达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不能用我们生来就被投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来衡量，而且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受来衡量。我们拥有科学，甚至可以说，这是不仅每一天，而且每小时都在发展的科学。我们知道许多，我们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知识。科学有权为自己的巨大成就而骄傲，完全有权认为，它的无往不胜的步伐是任何人也无力阻挡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不可能怀疑科学的巨大意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如今复活，他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来到的不是众人之国，而是诸神之国：亚里士多德再活十次也不足以掌握在他死后世界上所积累的知识，而亚历山大大帝也许能成功地实现自己征服世界的梦想。

“清楚明白”证明了寄托于其上的全部希望的无罪……

但原初的神秘之‘雾’并未消散，甚至更浓了。柏拉图未必需要更改他的洞穴比喻的哪怕一字一句。他的苦念，他的不安，他的‘预感’即使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中，也找不到答案。我们的在‘实证’科学之‘光’中的世界，对他来说仍然和当初一样，是昏暗可怕的洞穴，而我们仍然是被捆住手脚的囚犯，他必须重新做出超人的努力，就像搏斗一样，才能冲破这样的科学所创造的真理，这种科学‘梦想着真实存在，却不能清楚地看到它’^①。简言之，假如在今天，亚里士多德会赞扬知识，而柏拉图则会诅咒知识。反之，如果他们再世，我们的时代将非常热烈地接受亚里士多德，而坚决地拒斥柏拉图。

然而，试问，人的赞扬诅咒意味着什么，这种赞扬和诅咒有什么力量和权力，即便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真

①柏拉图：《国家篇》Ⅶ533c

理能因亚里士多德的赞扬而更真，或因柏拉图的诅咒而成为谬误吗？难道人能够审判真理，决定真理的命运吗？不，相反，真理审判人，决定人的命运，而不是人支配真理。人无论伟大与渺小，都有生有死，有出现和消失，而真理却长存。当任何人都还没开始‘思考’和‘寻求’的时候，真理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后来才向人们展现。当人们从世界上完全消失和失去思考能力以后，真理也并不因此而受损。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就是从这种观念出发的。他说，巴门尼德是“被迫”（αναγκασμένοι）与现象相一致的。在另一处，也是在谈到巴门尼德和其他希腊大哲学家时，亚里士多德写道：他们为真理本身所迫。^① 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真理有权奴役人、强迫人——无论是谁都一样，无论是伟大的巴门尼德还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无论是巴门尼德的无名奴仆还是亚历山大的卑微马夫。为什么真理能够统治巴门尼德和亚历山大，而巴门尼德和亚历山大却不能统治真理？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有人给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听不进，还会声言，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是显然荒谬的，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却不可能这样想。这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无情感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也不是说，他可能像哈姆雷特那样说他自己：“我是一只勇敢的鸽子，我没有胆囊，苦不使我难受。苦是让亚里士多德难受的。他在《形而上学》的另一处说，屈从于必然性是痛苦的，我们称强迫力量是必然的，正如欧维诺所说：‘凡必然之物，都令人痛苦。’而强迫就是必然性的一种形式，所以索福克勒斯说：“但是不可克服的力量迫使我这样做”^②。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4b 10。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5a 26—30。欧维诺（Evenus）——公元前 5 世纪哲学家和诗人。

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不可战胜的必然性面前感到了痛苦和难受。但正如他在此马上补充说明的，他深知，*Και δοκεῖ ἀναγκὴ ἀμεταπίστον τι εἶναι ὀρθῶς*，即“必然性不听劝说”。既然必然性不听劝说又不可战胜，也许，就只能服从，无论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应当服从并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也就是 *ἀναγκὴ στήναι*（必然停止）^①。为什么“必须停止”同必然性的斗争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其中包含着哲学的全部。必然性不服从劝说，甚至听不见劝说。屈辱既然别不可诉，就只有向天呼告。当然，在另外一些场合，甚至经常如此，总是如此，屈辱只呼告一声就沉默了：人们忘记了伤痛和沉重的损失。但也有忘不了的痛苦。“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手枯焦，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②——这句咒语我们已跟着赞美诗咏唱者重复了两千年。难道赞美诗咏唱者不“知道”，必然性既听不见劝说也听不见诅咒，必然性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怕，而他自己的声音必将成为旷野中的呼告吗？他当然知道，——甚至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清楚地知道。但是，显然，他除了知识以外，还有某种别的东西。显然，当一个人受到了像赞美诗咏唱者所受的深重屈辱时，他的思维就会完全意外地发生某些神秘莫解的变化。他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但却忘记了必然性的统治，忘记了这个（不知是被何人何时何故所武装得如此可怕的）敌人的不可战胜性，并同他展开了可怕的最后斗争，而不顾以后的结果如何。应该认为，普罗提诺那句话的意义就在于此：人的灵魂面临着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③

① 亚里士多德常常用这两个词指出，在逻辑学、本体论和任何一门科学中都不可能陷入恶无限，因为科学本身都是有开端的。例如，《形而上学》1070a 4。

② 《圣经·诗篇》137:5—6。

③ 普罗提诺：《九章集》1, 6, 7, 32。

柏拉图的下面一句话也具有这样的意义：“既然应当敢做一切，难道我们不可以尝试一下做无耻之徒吗。”^①只有当人的向往无限的愿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觉醒之后，他才能决定同全能的必然性进行斗争。但这种无限的勇气可能得不到任何辩护，它只是无羞耻的极端表现。只要看一眼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你就会轻而易举地确信这一点。在他那里，全部美德都分布在存在的中间部位，一切越过“中度”界限的东西，都是缺陷和恶行的见证。“必须停止”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像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一样，占据统治地位。他的最新成就是对必然性的颂扬，对服从于必然性的精神的颂扬。不仅善，而且真理也寻求跪拜的人。谁要是读过亚里士多德，哪怕是《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特别是最后几章）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九、第十卷，他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多么崇拜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听从劝说，他无力克服。在柏拉图身上最令亚里士多德感到愤怒（也许最令他不安）的是柏拉图的这样一种勇气，或用柏拉图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大胆和无耻”；这使他认为，服从必然性的人只能梦想真实存在，却不能清楚地看到它^②。柏拉图的话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虚构的，幻想的，故意做作的。但怎样能使柏拉图沉默呢？怎样迫使他不仅在可见的经验存在中服从必然性，而且在思想上给予必然性以它完全有权应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信念）的敬重呢？必然性不是对沉睡之人来说的必然性，而是对清醒之人来说的必然性。清醒的人能看见必然性，能看见真实存在，而“大胆且无耻”的柏拉图却使我们离开真实存在，把我们引到虚构的、幻觉的、幽灵的因而是虚假的境地。必须从人类中根除那些在柏拉图作品中表现

①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96c。

②柏拉图：《蒂迈欧篇》52b。

出来的“热爱自由”的愿望。必然性是不可抗拒的。真理本身按其本性来说，是强迫性的真理，对强迫性的真理的服从——这是人类全部美德的源泉。为真理本身所迫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就应当如此，从前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不是伟大的巴门尼德支配着真理，而是真理统治着巴门尼德。拒绝服从强迫性的、奴役人的真理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我们不能不赞扬这种真理，无论它迫使我们如何。这就是——人的和神的——最高智慧，——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人习惯于快乐地服从这个听不见任何声音的、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必然性。

二

我们在此要问：为什么强迫性的真理需要人的赞扬？亚里士多德何以如此为必然性谋求人的赞扬？难道必然性没有赞扬就不能生存下去了吗？既然必然性听不见劝说，难道能听见赞扬吗？毫无疑问，赞扬也和诅咒一样，很少能达到强迫性的真理。修道院里的石头对圣徒的动人的布道永远也不会作出“阿门”的回答。也不需要这样。需要的是“圣徒”面对沉默的石头——其实必然性也像石头一样对所有人都冷漠无情——发自肺腑地称颂上帝。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上文提到的亚里士多德——这位“思想”者的有形和无形教会的最高主教——《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的那几章。这里要求我们不仅要听从，而且要崇拜必然性：这曾一直是且现在仍然是哲学的基本任务。承认事物某种秩序的力量和事实统治，这还不足以成为哲学家。哲学家知道并恐惧（恐惧是全部知识的开端）的是，这种曾经征服了人的事实力量，总

是可能被另一种在其他方面起作用的力量所取代。甚至不愿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最终也不需要“事实”事实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不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在科学人士中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经验主义,正如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唯物主义一样。哪个科学家会去为事实而研究事实呢?谁会去关注雨后挂在电线上或留在窗玻璃上的一点雨滴?这样的雨滴成千上万,它们本身没有也不可能引起科学家的注意。科学家需要知道的是,一般的雨滴或一般的水是什么,如果他从河里取一点水,在自己实验室里把它分解成构成元素,那么,他不是为了研究和了解他手里和眼前现有的这点水,而是为了有权对所有的水作出判断,包括他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包括任何人都未曾见过和永远也见不到的,甚至包括那些在世界上尚无任何生物时就已存在于地球上的水。科学家,无论他自己有意无意(当然,大部分是无意的),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通常是不愿意),他都不能不是一个中世纪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与哲学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哲学家还必须对科学所运用的实在论作出解释和证明。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试图对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亦即实在论方法)进行哲学证明,但由于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所以,经验主义的任务事实上总是导致它所赖以维系的原则本身的毁灭。于是必须作出选择:你要做经验主义者,就要抛弃给科学认识找到牢固基础的希望;或者,你想拥有基础牢固的科学,就要使科学服从必然性思想的权力,而且要承认这种权力是原初就有的,不是在任何时候产生的,因而也是不会灭亡的,也就是说,要赋予这种必然性的权力以人们通常赋予最高存在物的那些优越性和品质。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做到了这一点,他也许不愧为进行科学思考的人们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教皇或最高主教。

康德在自己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写道:在哲学存在的

全部时代里，从来没有发现过哪一个真理，其意义能够和休谟的发现相比。^① 休谟——恰如忽然放开眼界一般——看到，人们在现象之间所建立的“必然”联系只是实际上的、事实上的联系，“必然性”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那些谈论必然性的人，只是在“梦想真实存在”，却不能明确地看到它。在评价和运用自己作出的伟大发现上，休谟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并且是世界上最珍视自己之稳重的人。也可以说，凡是那些放开了眼界并能够看到某种非常之物的人，都是如此：真理的太阳以自己的光芒照盲了阴影之国的居民。休谟把必然性从前具有的几乎全部霸权又都还给了必然性，而固天才思想家之精细的康德，则透过八十层羽毛褥子，在这个无人察觉的‘几乎’中感到了不适，于是决定进行自己的哥白尼式革命，以便使我们的思维重新走上那条数学所一直走过的正确道路……

休谟以自己出人意料的发现把康德从信条主义的瞌睡中唤醒。然而难道世上的人们有警醒不睡的能力吗？用普罗提诺的话来说，“警醒的本性”是人的自然状态吗？^② 另一方面，“难道人们在梦中或清醒时的梦想，不正意味着把像（现实）的东西不是当作像（现实）的东西，而是当作它所像的现实本身吗？”^③ 必然性与真实存在者就像两滴水一样相像，——但必然性不是真实存在者，它只对那些梦想者才是真实存在的。休谟的这个无人察觉的“几乎”假如保持了它第一次出现在这位苏格兰哲学家面前的形式，那么，它就会给那些思考和探索的人们以更大的帮

① 康德的确切说法是：“……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6 页。

② 普罗提诺：《九章集》Ⅱ，5，3。

③ 柏拉图：《国家篇》476c。

助。但休谟自己害怕了自己的发现，于是慌忙用手头所有的一切把它掩盖起来，以免它在眼前令人生厌。康德则不满足于此，他将休谟的“几乎”放在先天综合判断的范围之外，放入“超感觉的”，亦即完全不可及的、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和我们完全不需要的“自在之物”领域。休谟给予康德的震动把这位哥尼斯堡哲学家从梦中惊醒。但康德明白，自己的使命是要竭力使自己和他人不再受到这种惊扰我们安宁睡梦的突然震动，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休谟的“几乎”与形而上学一道，被推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围墙之外，而“必然性”的全部理由在康德以后都转向了这些先天综合判断，这些先天综合判断也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保证了欧洲人的安宁睡梦和对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世俗生活不是终极的、真实的生活，我们可能被从这种生活中唤醒（虽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正如被从梦中唤醒一样——这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显然是最不可容忍的和最可怕的思想。他在批判柏拉图的‘理念’时所谋求的，显然首先就是要摆脱这个（在他看来是）梦魇般的假设。他的惊慌在一定意义上是完全合理的，正如康德被休谟的“几乎”从信条主义的睡梦中粗暴地惊醒时的惊慌是合理的一样。柏拉图的“梦想”暗中危害着人类思维之根基本身。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东西，什么都可能发生，甚至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最不可动摇的”矛盾律也开始动摇了，在惊慌的人类精神面前展现了无可遏制的任性王国，这种任性具有既吞没世界本身，也吞没谋求认识世界的思想的危险。存在和思维变成了幻影。柏拉图怎么可以说出他的‘洞穴’比喻，他怎么可以杜撰出这个比喻呢？休谟怎么可以竟敢对必然性的权力提出质疑呢？难道人类不应当永远感谢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吗？——是亚里士多德用他的严厉批判和充满愤怒的大声疾呼终止了自己老师的幻想意图，是康德以自己的先天综合判断学

说把我们的思维引入了他的自然轨道。

对此不可能有两种回答。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实证科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实证哲学的奠基人。中世纪的人们把他看作是生活迷宫的领路人，甚至没有他就无法了解（也许并不是为他而写的）新旧约圣经，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近代哲学所走过且继续走的也是他所奠定的道路。康德也是这样：他战胜了不安的怀疑精神，使其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天使面前低下了自己不屈的头。

必然性获得了证明，尽管这种证明对它来说毫不需要。来自科学的圣徒，也像普通科学家一样地赞美必然性，虽然必然性对赞扬和辱骂都漠不关心。怀疑必然性的绝对权利的人，只能要么是坏人，要么是疯子。然而，是必然性本身由于人的维护而变得更加坚固有力了吗？或者，也许应当换一种问法：必然性的力量难道不正在于：是人们把它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并用修炼了几个世纪的咒语在它周围筑起了攻不破的大墙吗？

三

虽然塞内卡不是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但众所周知，他有时善于成功地把握和转达他人的思想。我们上面两章所说的一切，他用短短的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这句话成为名言：*ipse omnium conditor et rector...semper paret, semel jussit*（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只命令过一次，而总是服从）。这样想的不是塞内卡，而是古代人，是我们大家。上帝只命令了一次，然后他和我们人一起，就不再命令，只是服从了。他命令的时刻已经久远，无限久远了，所以他自己已经忘记，曾经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过这样不符合任何规律的，因而是反自然的事件，也许，甚至在无限久远的时间以来，他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命令那些被动服从的存在

物的能力,而和我们这些凡人一样,只能服从了。换言之,他曾经有一次表现出来的行动意志已耗尽了创造力,现在他注定要和他所创造的世界及世间万物一样,只能去实现当初的命令,虽然这些命令是他自己发出的,但也是永远不可违背的。或者再换言之:创世者处在了他自己所创造的必然性的权力之下,此必然性已成为宇宙的主宰,虽然它自己并未追求,也丝毫不愿如此。

我重复一遍:塞内卡的这个表述无疑是属于他自己的,但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世界各国所有有学识的人都曾经和继续这样认为。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有谁亲眼见证过世界是如何被造的吗?还是创世者向哪个人启示了这一真理?创造世界之时还谁都没有,谁也不敢夸口说他特别接近创世者。塞内卡所表达的思想之所以诱惑人们,正是因为它把那个神秘的不可知的 *jubere* 命令) 因素推到了无限的过去,并认为是不可重复的 (*semel jussit*, 只有一次), 而为人们的经常需要选择了 *parere* (服从), 这种 *parere* 不仅对受造物, 而且对创造者来说, 都仿佛是可理解的、自然的和正常的命运。塞内卡是对的: 在 *parere* 中一切都是可理解的, 明白的, 公开的, 因而是自然的。而在 *jubere* 中一切都是费解的, 随意的, 因而是离奇的, 永远不可知的和神秘的。假如有可能, 塞内卡和教塞内卡学会‘思考’的人宁愿不去回顾这个神秘 *jubere* (命令)。从来也没有任何人下过任何命令, 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和神秘的东西——遥远的古代也和现代一样——从来有的只是自然的和明白的东西, 就是说, 哲学的任务在于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支持和巩固必然性。但哪些方法对哲学来说是可行的呢? 凡人无力改变必然性的本质, 无力增加或加强它的存在。于是只剩一种方法: 用证据或咒语使人们相信: 一方面, 必然性是全能的, 和它斗争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另一方面, 必然性是来自神的 (是“一次命令”的结

果），拒绝服从必然性是渎神行为和大逆不道。这位塞内卡极其称赞忘记了命令的上帝和表示无限顺从的人们。“我不是服从神，我是接受神，我跟随神是出于我的本心，不是由于必然。”或者，还有，他转述曾受到西塞罗称赞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克雷安泰（Cleanthes）的那句著名的话：*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运引导着愿意从命的人，强制着不愿从命的人”），等等，——塞内卡或西塞罗的这类思考可以引述几十页……

有人会说，无论是塞内卡还是塞内卡所依据的克雷安泰，都是斯多葛学派思想的表达者，我们在谈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无权援引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们的片面性古代人就已注意到了。但我认为，狄尔泰的说法更接近真理，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近代是从西塞罗和塞内卡那里接受古代哲学的，是用他们的眼睛看古代人的。^①更正确的是：斯多葛派的片面性和犬儒主义者的粗鲁直率有时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更能向我们解释古代（和我们）思维的本质。人们对斯多葛派持傲慢的蔑视态度。但甚至远不可想象，假如斯多葛派撒播于世界的思想没有产生如此华丽的色彩，那么欧洲思想将会变成什么。只是斯多葛派有时十分坦诚，——而许多思想之所以得到认可，仅仅是因为它们善于不显露自己的真面目，必要时甚至愿意放弃自己和出卖自己。那个公然回头看见自己父亲赤身的含^②，被历史钉上了耻辱柱。可许多人也回头看了，却没人想到要揭发他们。回头看，反思，*Besinnung*，被认为是最荣耀的事情：全部黑格尔哲学，他的直接中

^①参见，例如，狄尔泰：《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表现。——哲学中的新观念》，文集 I《哲学及其问题》，圣彼得堡，1912 年，第 166 页。

^②含（*Ḥam*）——《圣经》人物，挪亚之子。他看见父亲赤身。见《创世纪》9:21—22。俄文 *Ḥam* 一词是“下流人”之意。——译者注

介,就是反思。有人会说,他对‘父亲的赤身’不感兴趣。我说,他回头看见了这样一些赤身,看它们要比看父亲赤身更加有罪。但黑格尔知道,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需要沉默的。斯多葛派就不‘知道’这一点,犬儒主义者更不知道。犬儒主义者的全部‘罪过’仅仅在于,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人性的、反思的理性。其他人,甚至所有人,特别是哲学家,罪过也在于此,——哪个人不信任理性呢?但是,其他人善于自我克制他们从对理性的绝对信任中所得到的许多东西,所以他们被誉为智者,而犬儒主义者被叫作狗。挪亚之子及犬儒主义者,还有部分斯多葛派,他们受谴责不是由于他们回头看和看见了‘赤裸的’真理 这是允许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不被原谅只是由于,他们对某个东西称呼它们本身的名字,回头看了就说看了,是赤身就说是赤身。看了但默不做声的人是有福的,看见了但又掩盖起来的人是有福的。何以如此?没人能回答。看来,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被魔鬼附体了,这个魔鬼在决定时刻强迫他作出这样一些判断和行为,其含义他自己也不懂且永远是不解之谜。然而,既然这个魔鬼存在于自然界,甚至无所畏惧的人都不能拒绝服从于它,那么,人们怎么能不好奇,这个神秘怪物是从哪个世界来到我们这里的呢 但是谁也不想问。人们知道,有某个人(也许是某种东西,正如可以说魔鬼是某人或某种东西一样),他(它)有权向人们提出无任何理由的要求,——这就足够了。魔鬼命令,人们服从。于是皆大欢喜:终于找到了一个约束和决定的权力,找到了摆脱“意志自由”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停止了,甚至“必须停止”——

αναγκη στήναι.

又有人会说,我超出界限了 以‘大家’的名义开始,却以一位著名哲学家的话结束。因为我自己刚才说的“必须停止”正是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但是,显然,普通人与哲学家并不远隔

千里 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开端或终点,在某些深层或表面,普通人和哲学家可能走到一起。塞内卡说出的“总是在服从,只命令过一次”是他从哲学家们那里找到的最后的智慧之语,但这句话只是套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亚里士多德也和普通人一样,丝毫不想知道 jubere(命令),他只需要服从(parere),以便履行他和大家所认为的‘人的使命’。对他来说,命令从何而来都无所谓,况且,正如塞内卡向我们坦率承认的那样,jubere 已经永远枯竭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下命令了,所有人将永远服从:无论伟大人物还是凡夫俗子,无论义人还是罪人,无论固有一死的众人还是长生不死的诸神。Αληθεια(真理)无偏心,对所有人都强迫。对伟大的巴门尼德也像对任何一个短工一样。“被缚的巴门尼德”和被缚的短工一样。甚至诸神也在必然性的权力之下:“诸神不和必然性作斗争”^①。……不能追问‘必然性’的这种强迫一切的权力从何而来。甚至不能问,这种‘必然性’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需要强迫活人,必然性不仅不会回答,甚至听不见向它提出的这些问题。必然性更不能屈从于训诫和劝说。亚里士多德自己善于观察他身后和面前的东西,他告诉我们,“必然性不听劝说”。无论我们来到哲学思维的哪个领域,我们碰到的都是这个盲、聋、哑的‘必然性’。我们相信,只有在这个‘严厉的’必然性王国,才开始有哲学。在终极规定性上,我们的思维不是别的,正是寻求这个‘严厉的’必然性。此外,巴门尼德早就确信:“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种东西”^②,这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的思维是必然发展着的、对全部存在内容之必然性的意识。必然性从何而来:是来自存在以便进入思维,还是来自思维以便进入存在?——我

①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45e。

②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7页。

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显然本能地感到，此问题不能使掌管着全部思维的认识论和掌管着全部存在的本体论彼此接受与和解，反而会使它们更加疏远和永远互相争执。谁也不想对像必然性这样的（虽然是古代的和大家都承认的）思想可能导致的结果负责。思维宁愿认为‘必然性’是存在的产物，在本性上更加不安的存在，则动辄拒绝必然性，宣布必然性是纯思维的产儿。或许，和巴门尼德所说的相反，存在毕竟不是思维。但另一方面，至少在哲学体系范围内，存在如果离开思维，就不能给自己找到充分的和完全对应的表达。虽然存在远不总是听命于必然性，但它与必然性作斗争的尝试尚未达到哲学。我们说过，哲学总是想成为反思，*Besinnung*，回顾。现在需要补充说，就其本质而言，回顾排除了斗争的可能性，甚至排除了斗争思想。回顾使人瘫痪。谁在回顾，谁回顾了，他就会看到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就是墨杜萨（蛇发女妖之一）的头，而谁要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正如古人就已知道的，他就必然变成石头。于是，他的思维，石头的思维，当然就将与石头的存在相符合了。

斯宾诺莎试图使人相信，假如石头具有了意识，那么它也会认为自己落地是自由的。斯宾诺莎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假如石头被赋予意识，同时保留石头的本性（显然，这是可能的，冷静的斯宾诺莎的尊严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保证），那么，这块石头显然片刻也不会怀疑，必然性是全部存在都遵守的普遍原则：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包括可能的存在。因为，难道必然性思想不正是对石化性（死板性）的最确切表达吗？难道被赋予意识的石头的思维和存在不正是我们在必然性思想中找到的全部内容吗？

现在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哲学曾经是、现在也是并且愿意成为回顾。而回顾完全不只是简单地回过头。当挪亚之子回

头一顾，他就从含变成了下流人。当犬儒主义者回头一顾，他们就变成了狗。还有更糟的，你如果回头一顾，看见墨杜萨的头，你就会变成石头。我知道，哲学家们不大相信这些神奇变化是可能的，也不喜欢有人谈论这些。但因此我又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魔鬼。就此而言，既然苏格拉底都有‘偏见’，既然苏格拉底都迷信，既然苏格拉底都寻求防止幻想的理性之“光”，从他自己所创造的清楚明白的概念世界逃向了自己的魔鬼——那么，我们难道没有理由，难道不应该怀疑，哪怕一生中只怀疑一次，只怀疑一瞬间，不是怀疑自己的存在（对此现在已无须怀疑了，也许，笛卡儿当年也无须怀疑），而是怀疑我们的思维，那种被我们习惯于认作是唯一可能的思维的东西，能把我们正确地带到终极真理的源泉吗？我们对自己说我们在思维——这并不意味着回顾，像我们已习惯于认为的那样，而是意味着向前看。甚至就完全不要看，闭上眼睛，走你必须走的路，什么也别猜测，谁也别问，什么也别担忧，甚至不要担忧走路时你可能不适应那些大大小小的“定律”，虽然人们把遵循这些定律看作是真理之可能性和由真理所发现的现实的条件。总之是忘记恐惧、担忧和顾虑……

有人会说，人无能做到这些。但我们再次想起了神圣的柏拉图，伟大导师苏格拉底的伟大弟子，他的遗训是：παντα γαρ τολμητεον（要敢做一切）。要试图反抗必然性本身，试图把活的、有情感的巴门尼德从死的、冷漠无情的力量统治下解救出来。对“必然性”来说，什么都一样，对巴门尼德来说，却不是什么都一样了，相反，对他来说，使一件事发生而另一件事不发生，就非常重要，比如，使毒芹依赖于苏格拉底，而不是苏格拉底依赖于毒芹。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使这样一件事发生，当公元前399年被自己国民判处死刑的年迈的苏格拉底从狱卒手中接过毒芹酒杯的时候，就在这一刻，毒芹按照苏格拉底的意志变成健身饮

料。这不是杜撰,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是曾经发生的事”。而历史教科书上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才是杜撰和幻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教导我们的“必然性不听劝说”是杜撰和幻想一样。必然性倾听而且能听见劝说,必然性不能同苏格拉底作对,不能同人作对,人认识了必然性力量的奥秘,人有足够的勇气不去反思它,而是命令它;教训它,正像有权柄的人’^①

当然,亚里士多德对这一思想不会予以注意。塞内卡和克雷安泰也会与这一思想擦肩而过,把它当作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不予理睬。但这一思想却引起了爱比克泰德的勃然大怒:因为这是企图超越矛盾律的界限。这对他来说仿佛是致命的罪孽(当然,也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样),他认为,他在此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愤怒。他说,假如我做了不承认矛盾律之人的仆人,他吩咐我给他酒,我却给了他醋或更坏的东西,他就会愤怒,吼叫,说我给他的不是他所要的。那么我就对他说:因为你不承认矛盾律,所以,无论酒,醋,还是随便什么脏水——都一样。你不承认必然性,那么,就谁也没有力量强迫你把醋当作坏东西,把酒当作好东西。你就像喝酒一样吃醋好了,你也能得到满足。或者这样:主人吩咐我给他刮脸,我却用剃刀割下他的耳朵或鼻子,他又会开始吼叫——我则对他重复我的上述理论。我就如此这般地做所有的事,直到迫使主人承认如下真理:必然性是无法战胜的,矛盾律是有无限权力的。^②

我们看到,这是在重复亚里士多德,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话作注释。而且,正如斯多葛派几乎总是如此一样,他在作注释的时候,把亚里士多德有意留在黑暗中的东西也暴露出

① 《马可福音》1:10。

② 《古代史学报》,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期,第254页。